

# 民主不是万能的

王千马 © 著



中国如何积极融入世界，又如何在世界游戏规则下发展自己？

站在中国的立场读懂世界，站在世界的立场读懂中国。

跨国公民的中外生存及比对，由陌路到融合，从彼岸到此岸。

刘瑜 & 加藤嘉一等跨国公民观世界看中国



中国发展出版社

# 民主不是万能的

王千马◎著

福建师范大学  
图书馆  
藏书印

刘瑜 & 加藤嘉一 等跨国公民观世界看中国



T0993858

JP 中国发展出版社

099385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不是万能的 / 王千马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80234-741-0

I. ①民… II. ①王… III. ①民主—文集  
IV. ①D0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2299号

书 名: 民主不是万能的

著作责任者: 王千马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4-741-0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46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10561295@qq.com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跨**国公民，又叫全球公民。在全球化时代，这样的人实在是太普遍了。

无疑，此书里的刘瑜、徐贲、玛雅、翟华、田原、加藤嘉一、李旻泰、徐滇庆、连鹏、王晓鹏这十人，正是这些跨国公民的代表。

在中国，跨国公民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留美幼童；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批人怀抱着人生梦想以及改变自身命运为目的而出国，成了“洋插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透露，自1978年以来，106万中国学子留学海外，他们在异乡的土地上挥洒汗水，并积极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在世界逐渐掌握话语权，这些“洋插队”也开始改变“把异乡作故乡”的心态，积极回国创业成为“海龟”……沐浴着留美幼童的足迹，穿过“洋插队”的身影，浴着欧风美雨，他们长成了全球化语境下的跨国公民。

美国著名民调专家约翰·佐格比曾于2009年将18~29岁的美国年轻一代称作美国的第一代跨国公民，他们对二战、冷战完全没有记忆，因此最有可能在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方面主张平衡，最不可能主张跟伊朗打仗。他们更有可能拥抱其他民族的文化。相对应的是，中国第一代跨国公民虽然在70后甚至60后中已有零星出现，但80后以及90后们是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以及互联网兴起等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更有可能意识到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的。

他们不再“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期救亡图存，也不单为了追求个人幸福，或是改变人生命运。他们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毫无障碍地进进出出，如电子产品的按钮那样自如地来回切换，甚至乐此不疲。在他们身上，有中国性，也有世界性。中国性的他们，会站立在中国的立场上触摸世界；世界性的他们，却能在世界的高度上打量中国。他们满心希望中国和世界能形成良性共振，而不是恶性循环。他们是热血的亲历者，也是清醒的围观者……他们要想成为真正的跨国公民，除了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超越自身国籍的局限之外，还必须要有全球意识，以及积极追求普世价值。他们身处在哪里不重要，是什么样的血缘不重要，是追求

“救亡图存”还是“个人幸福”也不重要，但他们必须要坚定地站立在平等、自由、反战，以及环保等全球立场之上，并为之摇旗呐喊或践行理想。

书中采访的十位活跃的跨国公民兼意见领袖就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畅谈这个时代的三个主题：民主、全球化和生存尊严——希望能给如今出国求学或者回国就业的“海龟”们，还有满天飞并有多重国家生活体验的人们找到一种心灵诗意栖居的理由。

关于民主，曾远在英国剑桥教书的刘瑜，被誉为“很有力量的一位女性”。她认为民主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劳什子，而是具体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当中；她认为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一定要依赖于那些草根力量的蓬勃兴盛，中国的未来必须翼望于这种活跃的民间社会力量才能够发展的起来；她认为中国的70后女性对中国公共事务并不关心，是一个断层，而作为同样的70后女性她愿意呼吁一下“关心民主，本质上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关于全球化，来北大进修的加藤嘉一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成功了，他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各大媒体上点评时事，并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某些看法，他还真诚地发现了中国的美，他被大国给诱惑了。从人生的长河里看，作为一个以后立志从政的日本人，他宁愿被大国诱惑，为以后的仕途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履历。

关于生存尊严，田原是一位诗人，也是精神世界最纯真的人，他去国怀乡在日本已经有20年左右的光阴，并获得日本第60届H氏诗歌大奖。他说在那里除了严谨之外，学会了两件事情：谦和和感恩。他认为诗人应该跟政治保持“九米的距离”，与政治保持距离，也更容易超越于政治。看到国内诗坛“梨花体”和“一把豪乳”乱飞的现状，他想提醒那些写了几首不错的诗后膨胀的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要学会谦卑。这类诗人大都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刻薄一点说，是一种无知和浅薄；而国内外有大成就的诗人不但十分谦卑，还都具有优秀的心灵气质，因为谦卑是做人的基本品质，让人收获生存的尊严。

.....

这些跨国公民们爱母国，也爱移居国。反过来同样成立，也正由于他们在国与国之间来回生活或工作，人生便有了双重经验甚至是多重经验。他们会用世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母国，也会站在母国的立场来打量世界，来为母国和世界寻找一种新的平衡。

编者

2011年11月11日



## 刘瑜：关心民主，本质上就是关心自己

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剑桥大学讲师，2011年回清华大学任教。著有《民主的细节》、《送你一颗子弹》。

我关心政治关心民主主要是这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觉得对人的命运——尤其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候的那种状态的不服；还有就是我觉得当你看到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生态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其实很多在我们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东西，保不准都是有问题的。

启蒙并不是说把你自己所掌握的真理——好像你觉得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理——灌输给别人。所谓的启蒙是一种出走，就是一种引领人们看到有别样生活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也许是不对的，但至少让你知道生活中其实是有别的可能性的。这个表述方式我是比较喜欢的。

我觉得一些所谓的刁民，包括那种一遇到拆迁，就特别爱讨价还价的人……他们在面对公权力的时候，那种显示出来的毫不退让，甚至是有有点得寸进尺的作为，至少在中国当前的背景下，改变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那种讨价还价的边界。我们这些不太较真的人，这些普通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搭他们的便车——搭他们开拓这种民间的私人的权利空间的便车。

## 徐贲：政治八卦的公共意义



1950年生于苏州，先后在苏州大学、复旦大学、马塞诸塞州大学求学，英语文学博士。现任职加利福尼亚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 (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 (1999)、《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998)和《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2005)、《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2008)、《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2009)、《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2010)《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2011)；编有父亲的回忆文集：《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2010)。

政治八卦是在政务不公开、政治不透明的情况下出现的群众话语，虽然只是一种替代公共话语的私人话语，但也包含着某种民意。这种民意有它的公共意义。八卦以负面性质的议论居多，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八卦本身必然蓄意造谣中伤，而是因为讯息的传播本来就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特点，而且，八卦传播的多数是本不该保密，但却就是不公开的讯息。八卦和负面消息有联系，责任并不全在八卦。

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只是比较安全的制度。选举不一定能够找到伟大、英明的领袖人物，但至少可以作为多数人参与政事，遏制暴政，预防专制的有效方式。选举虽然可能一时选出无良不才的人物，但那总比受损害于永久的独裁政治要可以忍受一些，再说，无论前一次选择有多么失败，下一次总还有纠正过来的可能。

就算民主选举是折腾吧，那也是公民折腾当官的，不是官员折腾老百姓。在定期举行的民主选举中，议员、市长、州长，乃至总统，哪个不是战战兢兢，哪个不是要想得到选民的好感，害怕被他们折腾下台？正是因为老百姓有定期折腾官员的权利，当官的才没有随时折腾老百姓的权力，才不敢胡作非为，才不能在官位上一坐就是几十年，直到“光荣退休”。



## 马雅：空谈普世价值观，解决不了中国目前的问题

生于南京，长于北京，籍贯湖南。当过兵，当过国家公务员，1990年赴澳大利亚学习英文，1992年转美国留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2002年加盟香港凤凰集团，任《凤凰周刊》副主编。著有《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当代中国思想界国是访谈录》（海外版），主编《聚集当代中国价值观》、《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在美国出版英文论著《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2010年推出新著《亲历美利坚》。

我们应该尊重民主，但是不能迷信民主，不是把西方的大选拿过来就民主了，选举民主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遭到失败。中国应该找寻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发展民主要考虑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实现少数精英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追求自由民主，一定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应该像胡诌说的，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点现实问题。到底是幸福重要，还是市场和民主更重要。

关于社会核心价值观迷失，确实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国在过去30年，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进入的速度太快了，用哈佛学者黄万盛的话说，各方面的反应都来不及，下两代人都已经被改变了。今天“80后”、“90后”的思想方法、情感方法、表达方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后现代意识的程度已经很高了。

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如果不了解别人的文化，对自己的文化也不会有深刻的理解，因为他不会刻意地去体会那些已经渗透在自己血液里的东西。人们常常是在观察别人的同时领悟自己，在借鉴别人的同时完善自己。

美国梦之所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追求者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是因为这个梦是可望而可及的。而如果由少数人垄断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就会产生贵族社会。中国今天就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防止出现贵族社会，不要有钱人的孩子上“贵族学校”，农民工的孩子入学无门。



## 王 华：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制度”很浅薄

山西省籍，生于湖北武汉，儿时在天津，就读在北京。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毕业后，于1984年7月赴法国留学，1989年6月获得能源经济学博士学位。熟练英语、法语，自修日语，进入国际组织从事发展援助工作近20年，先后在泰国、科特迪瓦、菲律宾等地居住，负责南部非洲、东南亚、南亚地区的能源与电力投资项目。因工作关系，走遍亚、非、欧、美各国，悉心观察文化细节，个性解读中西差异。自从上个世纪中互联网开始普及以来一直笔耕不辍，是中文互联网较早的写手之一，主要作品先后收入2000年后陆续出版的《闲说外国人》、《地球村札记》、《十二亿火星人VS六千万火鸡人》、《畅游天下20年》、《东方文化西方语》、《国际公务员奇记》等书。

作为一个世界公民，觉得国家的所谓自豪感有点像是浮云，更重要的是每个公民对自己的生活现状的感受。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总体来说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条件达到大部分法国人生活上的那份“五十年不变”的从容。我前面把中国比作一个窜个的青少年，从一个细高挑成为一个行如风坐如钟的成熟汉子，一方面营养要跟得上，另一方面要知书达礼。换句话说，一要有可持续的物质基础，二要有成型的价值体系，在这两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还都有进步的空间。

我有个感觉，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一切的问题都归咎于“制度”，这是一种貌似深刻其实浅薄的思维定势：明明知道制度的演进必然是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把一切归结在制度的不完善上当然是错不了的。类似地，把一切问题都看做是某些国外特定人群的阴谋论也是属于一种简单思维，虽然可以哗众取宠，但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最难的是着眼于自身，在现有的空间范围内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就需要来一次中国式的心智启蒙，让公民走向思维成熟。

我们应该创造出能够影响对方、造福于世界的新的价值。这对于中国来说尤其是一个挑战，当今的外国高等学府教科书里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创造的经济理论和文化理论。外国人一提起中国，想到的就是唐诗宋词。我们不能永远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切全靠解释经典，必须要有新的理论。如果中国不进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和理论体系的创造，中外文化交流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稳定状态。



## 田原：说“中日终有一战”是不负责的，与爱国无关

诗人，文学博士。1965年生于河南漯河，90年代初赴日留学，现在日本国立东北大学任教。先后在内地和台湾出版过《田原诗选》等五本诗集。在中国台湾、中国内地和美国获得过华文诗歌文学奖。2001年用日语创作的现代诗获日本第一届留学生文学奖。2009年用日语创作的第二本诗集《石头的记忆》获得日本第60届H氏诗歌大奖。在日本出版有《谷川俊太郎论》等多部文论集等。主编有日文版《谷川俊太郎诗选集》（文库版三卷）、《我的心太小——谷川俊太郎爱情诗选》等。在国内翻译出版有《谷川俊太郎诗选》、《春的临终——谷川俊太郎诗选》、《异邦人——辻井乔诗选》等。发表有中、短篇小说和大量的日语论文。编选有两册日文版《中国新生代诗人诗选》（竹内新译）等。

作为一名诗歌写作者，不能不思考为什么读者在渐渐远离诗歌？我觉得责任更多的在于诗人自身，读者当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和因特网的发达导致了一些肤浅和廉价的文化的肆意泛滥——如漫画、电视连续剧、电子游戏、无聊的电影、卡拉OK等等，这或许带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更多的人成为这种流行文化的牺牲品也许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

经典  
语录

语录

说到汉奸，我突然想到日军侵华期间，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为日本军效劳的汉奸？而日本却几乎没有出现过背叛他们的人？！这是一个一言难尽用一本书都阐释不清的民族精神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是永远值得反省的！

日本的年轻一代跟国内富二代的同龄年轻人在生活方式应该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同，再就是大的文化环境也不同。据我所知，大部分家境富裕的日本年轻人很少“显富”。他们大都生活得很朴素，活得很真实，且非常懂得节俭。尽管如此，肯定也存在在物质富有后丧失大志和缺乏进取心的年轻人，这是一个世界普遍的富裕综合症。



## 加藤嘉一：中日两国人民对方兼有自信和自卑

1984年4月28日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在校期间，担任北大日本人协会会长。是中日交流、中日关系的热衷观察家、评论者。专栏作家。著有《七日谈——来自民间的中日对话录》（合著）、《日本走向何方》（译著）、《中国，我误解你了吗》（编著）以及《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自传）等作品。

说说我比较熟悉的北大学生，大部分学生都随大流，刚刚入学的时候还五花八门，但一旦到北大那样的环境里，大家都互相牵制，不知不觉形成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的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比如，就国际关系学院而言，进到摩根士丹利、高盛集团等外资银行，或成功申请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才是胜者。最受欢迎，教“怎么赚钱？”的光华管理学院更是如此……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今天的中国，越精英越从众。这点很要命，价值观的多元化是一个社会健全与否的重要标准。

据我观察，日本和中国年轻人有同样的毛病，即严重缺乏“自问自答”的习惯和能力，而总渴望有人陪你聊天，把解决问题，寻找答案的希望寄托给那些介绍方法的图书什么的，而往往忽视自我对话。我不一样，很重视一个人的时间，尤其在走路的时候总是与自己内心聊天。

我很反对“成功”两字，每个人都应该具备对成功的定义和态度，内涵和唯一性更重要，世上没有唯一的成功，更没有可复制的成功。

历史上，从来没有强大的中国和强大的日本同时存在过。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认知对方，与对方打交道。两国人民对对方都兼备着“自信”和“自卑”。比如，日本人原来以为自己的经济实力远远大于中国，但近30年以来中国崛起，自己则陷入“失去的20年”，对活生生的进取中的中国感到羡慕；中国人在国家崛起的过程中越来越自信，但却知道，自己的社会成熟度和现代性，生活水准等还不如日本。中国商人马云说过：“日本人是世界上最挑剔的民族。”在如此复杂的情绪互动下，狭隘、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容易掀起，并在两国之间蔓延下去。我个人认为，这样两国人民对如何认知对方的问题上感到困惑的局面还会持续10年。但这是必要成本，必然现象。



## 李是泰：韩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包含着一点同情

韩国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位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外国留学生。上世纪80年代，在韩国全南大学选学哲学专业。参与过韩国国内的民主运动。

谈起韩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其实也好理解。说实话，这个地球上任何两个靠得太近的国家，关系都不是特别好，都有着互相防备着的心理。

不管怎么说，韩国人尽管对中国存在着偏见，但这种偏见跟别国还不一样。别国的偏见说不准是一种幸灾乐祸，韩国人的偏见却会包含着点同情。毕竟，韩国文化跟中国文化贴得很近，很长一段时间里，韩文里都有中文，否定中国的话，那么也就等于否定韩国自己。别看韩国在现在跟美国走得很近，但在事实上，韩国正逐渐地依赖中国……

经典  
语录

我得提请你注意的是，在我们东方儒家文化里，国家权力是被无限放大的，我觉得反腐败的第一要义，其实就是要改造公务员。而改造公务员的第一要义，其实就是改造集团一把手。因为在中韩两国，一把手的权力是相当大的，而且在他们这个层面上，受到的监督也很有限，所以这注定着，一把手要是素质高，接下来的日子就好过，一把手要是素质不高，接下来的日子就很难过。总而言之，在这种体制难以改变的当下，我们只能期望能遇到好的一把手。

我觉得我们两国的教育都是有问题的，都是站立在各自国家或者说民族的立场上，却没有站在人的立场上。没有教好各自的学生，人与人应该是怎么交流，人与人之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社会道德，反而是将别国的国民当成了非人。我记得我幼年受教育时，给朝鲜画像，总把他们的形象画成是鬼。

中国对韩国最严重的偏见是在文化上。前面说，中国经常宣传自己是伟大的，辉煌的，当然也经常说自己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文明、地大物博的国家——简言之，就是古、大、多……我们不反对中国这样的提法，但我们反感的是，你们中国人跟别人交往时，动不动就拿这三个方面跟别的国家比。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同时具备中国这三个特点的？

## 徐滇庆：在加拿大，地方政府的权力非常有限



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第九届(1994~1995年)中国留美学者的经济学会会长、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请不要责怪那些唱空房价的人。在这个年头，多一些人站出来替老百姓呼喊，实属难得。尽管他们对房地产市场的规律摸不清楚，判断失误，可以还是得支持他们替穷人讲话。他们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理应得到保障。中国的民主气氛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即使说错了，也要爱护，鼓励他们继续自由地发表意见。我们这些专业研究人员有的时候都会说错，何况他们这些非专业的人员？

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国家的年青人对报考公务员那么积极。当前的混沌状态最有利于贪污腐败。但在加拿大，地方政府的权力非常有限。市长、省长管的主要是市政建设、收垃圾、消防等，连中小学的经费都要经过议会讨论批准。市长能够支配的资金很少。除了中央银行之外，所有的银行都是民营银行，土地的产权非常清晰，大部分都是私人所有。最主要的是人家的法制很健全，如果有纠纷就可以上法庭。强拆民居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国能够在土地产权改革上加快步伐，使得土地产权界定清晰化，就可以避免很多冲突。

我想，只要有一套好的制度，政府其实用不着管那么多。凡是市场机制能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政府干预。目前，有些人遇到问题不是试图通过改进市场机制而是倒过来要求政府干预，实在是搞错了方向。对于许多官员来说，请他们干预经济，他们高兴得很。他们手中的权力越大，寻租空间就越大。这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因此，改革的大方向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改革，缩小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权力。

许多加拿大商人已经到中国去了。但是他们极端缺乏对中国的基本了解。加拿大人的法制观念很强。事事要守规矩。非常重视商业道德。可是他们在中国遇到了新问题。由于中国正处在经济改革之中，许多规章制度都不健全，甚至有法不依、开后门、行贿贪污等等，给了加拿大商界很坏的印象。要宣传中国政府建立法制的决心，同时也要让加拿大朋友们明白：在建立法制的过程中最严重的任务是教育群众。要有耐心，要花时间。不教而诛是不符合人权原则的。

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个金融问题。如果钞票多了，物价非涨不可。加拿大没有“发改委”，人家的统计局定期发布数据，有板有眼，经得起检查。对于统计部门来说，好像造假并没有什么好处。统计局只不过是拿政府钱的一个专业部门，没有行政级别，政府通常并不干预统计局的事情。



/175

## 连明：中国的未来要看90后甚至00后

19岁留学加拿大，24岁从事媒体行业，加拿大华文媒体副主编，专栏作家，在深圳《晶报》、《新快报》、《时代周报》，新浪网等媒体撰稿。

加拿大统计局报告指，20年后，多伦多的少数族裔人数，将超过本土生长的白人，与在30年前黑人坐公车还不能坐座的严重歧视比，而现在表面的歧视和不公几乎罕见。一个城市允许外来人口超越本土人，而没有任何偏见和甚至怨言，这种多元和包容，不是高楼大厦可以比拟的。

中国大城市的国际化，太注重硬件了，也有些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色彩，当一个城市可以因决策者的意愿随便强拆，从未或很少聆听民意，那样的发展很难说是以人为本的。这种国际化也是缺乏内核和价值的。中国的司法在其他国家遭受质疑，我们也应该努力向世界“自证公正”，积极努力推动司法公正公平，在保障人权的道路上继续进步。

和加拿大相比，中国文化自古教育人要做“人上人”，每个父母总是希望孩子成为“伟大的人”，而从来没有思考过希望他/她做什么样的人。其实中国人向来不乏功利和实用主义精神，记得小时候我们读书，诗里也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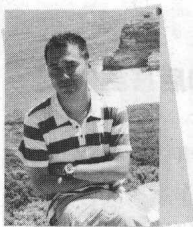
除了教育和文化因素外，社会的分配不均也是造成中国出现“人上人”的重要因素。当权力成为稀缺，当资本只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难免使得社会浮躁。于是“往上爬”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正因为有了“人下人”存在，才有了“人上人”。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往上爬，是因为担心成了“人下人”后，活得没有尊严。而社会大众也总以不太健康的心理去衡量成功和失败，无法尊重社会的多元性以及人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人们居住的房子越来越大，但亲情却不断在贬值。我们不断聚敛物质财富，但幸福感却逐渐消失。在如今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莫名的群体恐慌，大家缺乏安全感，认为如果不赚足够的钱，就会被社会抛弃。似乎整个社会都变成了以金钱为目的的商场，每个人都变成了“商人”。即使普通的民众，也都在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为了找工作弄个假经验，为了升职搞一份假学历。现在对中国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保障公平，并重塑道德价值观，其重要程度一点都不亚于GDP指数的增长。

经典语录

目录

9



## 王晓鹏：南非依旧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201

男，老家山东潍坊。2003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新闻系，2005年移居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南非约翰内斯堡市。在南非，经历过老板被枪杀、诈骗、抢劫等一系列事件，目前已在这座城市生活得游刃有余——做点小生意，幻想着能发点财，然后回国不断地买房子置地，等老了以后能过上地主式的美好生活。与此同时，笔耕不辍，是中国《环球时报》、《南方人物周刊》、《齐鲁晚报》、《非洲杂志》、网易网、大众网等媒体的南非特约记者。

我个人认为，以低人权换取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对的，但从低人权到高人权，也应该是一个逐渐开放的过程，不能像南非这样，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低人权国家转变成完全民主的高人权国家，这样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南非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二元体制”、“流动工人”、“有序城市化”等方面都是中南两国的相似之处。此外，在“有序城市化”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对付流动工人的方法和方式，竟然出奇地一致：中国多数城市设立“城管”，而南非直接设立“城市警察”（Metro Police），就是给每位城管队员都配上枪，让他们去对底层民众执行打砸抢等任务。

经典  
语录

南非政府在解决“有序城市化”的过程中，有一样做得要比中国政府好得多，那就是大量修建黑人免费住房，这远远好过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不幸的是，在中国国内，因官商勾结太严重，几乎每座城市修建的经济适用房，到最后都变成了商品房出售；普通百姓如果想租到77元/月的廉租房，恐怕都是在天方夜谭。

在各项政策收紧的今天，南非的经商环境也比中国宽松得多：只要花折合5、600元人民币就能注册个公司，只要你有合法身份、按时缴税，就基本没有人找你的麻烦。这可不像中国，在中国做生意，恐怕有无数个部门想找茬就找茬、想罚款就罚款，连个辖区的街道办事处都会时不时找你麻烦，让你交个几千块的赞助费都可以被视为正常现象。

英国 ↔ 中国

刘瑜



关心民主，本质上就是关心自己

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剑桥大学讲师，  
2011年回清华大学任教。著有《民主的细  
节》、《送你一颗子弹》。

认识刘瑜是从她的《民主的细节》一书开始。在一次做客某门户网站时，该网站让我给读者荐书，我不假思索就写下了这本书的名字，然后附上一句话：从小处了解大民主。

似乎从这本书开始，刘瑜的名气在国内一日千里，扶摇直上。

一开始，我把她当成了苏珊·桑塔格式的女人。美国的苏珊·桑塔格拥有一大堆桂冠，比如“美国公众的良心”、“文学批评的帕格尼尼”。是很有力量的一位女性。不过，刘瑜却说自己不认识她，而且也做不成她。刘瑜说自己其实是一个随和的女性，甚至有时随和得没有了自己的原则。做事认真，但不较真。

有人就说，读刘瑜的文章，发现女人看政治，没有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想化的东西，却像管老公一样对政府，双手叉腰，说：“上个月你钱花哪去啦？你这个没良心的坏东西！”——这种比喻很让人乐不可支。在刘瑜眼里，这样的质询其实就是民主的体现。事实上，民主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劳什子，也不是什么抽象概念，它具体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当中。而我们每个人，对公共生活或者说对权利的来源，以及权利如何使用这些问题的关心，也是一种比较本能的事情。

说到底，关心民主，本质上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不得不承认，在这样一个不鼓励女性关心公共事务的大环境里，而且在众多70后女性更喜欢个人叙事偏好“私”话语的背景下，突然有这么一位跳了出来，关心政治提倡民主，有那么点突兀，但也将她给凸显了出来。于是远在英国剑桥教书的她，就这么出口转内销似的，在中国红了。

红了后的刘瑜，干脆选择了回国。她说自己是研究社会和政治学的，时逢大转型的中国，要比英国热闹多了，还恰恰能提供多种研究样本。这也给了我和她对话的方便。从互联网上的电子邮件联系，直到某一晚在北京著名的万圣书园的咖啡吧，笔谈加面对，我们来来回回了多次，终于把